

知識天地

永遠的「歐吉桑」： 追憶王世慶先生

蔡慧玉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

「歐吉桑」走了，在今年（2011）一月十六日悄悄地走了。王世慶先生是一位謙沖低調的資深台灣史學者，一九二八年出生，戰前先後就讀州立桃園農校及府立台北師範本科，戰後「三進三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四次參與纂修《台灣省通志（稿）》。他終生致力於台灣文獻的整理和民間文書的採集，長期投入艱辛的文獻解讀和台灣史知識的傳佈，包括介紹和提倡台灣總督府、台灣拓殖會社等檔案文獻的利用和蒐藏，並默默搶救、保存了無數的地契、族譜、鬮書等古文書，其用力最深的工作包括參與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小組（1974-1982），彙編《台灣公私藏古文書》。這批文書堪稱台灣史研究上的寶庫，共一百二十巨冊，達五千六百件（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小組，1977-1984）。王世慶先生也是台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先驅之一，其代表作包括《清代台灣社會經濟》（聯經，1994）、《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6）、《台灣史料論文集》（稻鄉，2004）。一九九三年九月，中央研究院破例援聘王世慶先生為社會科學人文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王先生為學篤實，熱心提攜後學，對台灣學界的影響重大且深遠。他在二〇〇二年獲頒第二十五屆吳三連獎（人文社會科學獎歷史學類），國史館也在二〇〇八年頒給他台灣文獻館傑出台灣文獻獎（終生文獻貢獻獎）。關於王先生的學術成就、生平回顧、影像紀錄和紀念文集，請參考：許雪姬等人訪問，丘慧君記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台灣心文獻情》（台北縣政府，2010）、《台灣風物》61卷2期，以及《台灣文獻》62卷1期。

* * *

在這些懷念「歐吉桑」的日子中，我的記憶逐漸集中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上。一九八一年八月中旬我出國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全額獎助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最初的專攻是中國近代史，之後逐漸對日本史產生莫大興趣。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正式撰寫論文之際，才毅然改向研究日本殖民地史，折衷考慮了個人在這兩領域上的志趣和專攻，選擇以「日本統治下台灣的保甲制度」為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東亞研究向來屬於地域研究的一環，當時日本殖民帝國的研究才剛起步，台灣史研究也尚未成為「顯學」，中途轉換跑道需要很大的勇氣。所幸，當時我的指導教授 Madeline Zelin（現任 Dean Lung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大力支持我，日本史教授（現任 George Sansom Professor，近代日本思想史）Carol Gluck 破例接受我，我因此得以在學位攻讀中途，轉換跑道，開始從事日治台灣史的研究。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我先後兩次返台，利用暑假期間蒐集資料數週，認識「歐吉桑」就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次返台之行。拜「歐吉桑」之賜，我認識了程大學等文獻會前輩，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高碧烈先生等人也給予我研究上最大的方便，讓我在館內自由閱讀和大量影印日文圖書資料。

在兩次短暫的返台期間，我幾乎都將全部精力和時間花在台灣分館的資料蒐集上。從一開始，「歐吉桑」就耐心指導我如何涉獵日治時代總督府遺留下來的龐大史料和先行研究，並特別囑咐我仔細查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總督府府報》、《台灣警察協會雜誌》、《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警察沿革誌》、《台灣治績志》等基礎史料，當然也包括「台灣總督府檔案」（主要是指「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今天吾人耳熟能詳的這批「省文獻會鎮館三寶」，當時都還未編目，更談不上數位化。事隔三十年，這些書誌檔案對新世代的學人仍然是日治台灣史入門必讀的書單。但是，當年「台灣總督府檔案」還典藏在台中市南屯的黎明新村，調閱和使用都受限極大，而我長年住在美國（1981-1992），能兩次蜻蜓點水地自費返台蒐集日治台灣這批龐大的資料已經十分不易了，因此我將研究重點擺在現有資料的蒐集上。我特別感謝哥大東亞圖書館當年的中文圖書館研究員 Jack Jacoby 先生，因為他費心協助我從史丹佛大學採購一批

《台灣日日新報》的微捲（當時只有發行至戰前，1898-1936）。關於這一段事情的始末和王世慶先生對我的入門指導，我已經另文交待（詳閱 Hui-yu Caroline Ts'ai, "Foreword," in "One Kind of Control," UMI;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茲不贅述。

在哥大攻讀博士的九年期間，我幾乎每年都拿到獎學金，其中有校外的，但大部份獎助來自哥大，所以我對哥大的栽培十分感激。但是，紐約市的生活水準高，扣除房租、水電等費用後，就是省吃儉用也所剩無餘，所以博士班後期我必須在總館的電腦編目部門每週打工二十小時來支付各項研究經費。那時我住在哥大附近、一百一十三街的一棟大學所屬建築的三樓分租公寓，有五年的時間（1985/6-1990/5），我一到下午四點五十分就到 Butler Library 打工，每週五天，每天四小時。晚上九點下班後，我經常到一百十四街一家上海館子（月宮，九十年代初結束營業）買一份盒裝的肉絲湯麵回家，一面吃著晚餐，一面把新聞報導當英文課上，直到十一點再開始另一階段的夜間研讀工作。以《台灣日日新報》為例，我花了一年半時間從頭到尾調閱、影印、整理和解讀，而我的影印費就是來自工讀的收入。《台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喉舌」，刊行近五十年，我應該是第一位將這個報紙深度分析、系統性地用在學位論文的研究者。二十年多來我在每一個寫作階段，都會向「歐吉桑」請教。如果這些年來我在日治台灣史的研究上有任何成績，那都要歸功於「歐吉桑」的提攜和教誨。

* * *

我自認是「歐吉桑」的私淑門生，但我們的接觸實際上並不多。其中一段美談發生在我論文撰寫的最後一年，那段日子他剛好在紐約。一九八九年深秋，我正進入論文撰寫的定稿階段，同時也展開了求職活動，一年之間校園面談多達十次。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歐吉桑」的電話，說他人在紐約，從此我和「歐吉桑」開始了一段長達半年的師生緣。原來，「歐吉桑」那時已從省文獻會二次退休（「二進而出」，1983/2/18 - 1988/12/31）。那年五月，「歐吉桑」的長孫誕生，所以夏末初秋他到紐約探親，與當時正在紐約市攻讀博士學位（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的獨子——王孟亮（現任中興大學獸醫系教授）——住在一起。進入論文寫作最後階段的我，正為制度史上許多環節無法解釋而感到焦慮，所以時常打電話「求救」，經常一週數次，每次都花上「歐吉桑」二、三小時，而他總是熱心地、耐心地幫我「上課」，隔著話筒解我疑惑。

「歐吉桑」是一本活字典，也是我進入台灣史研究的真正導師。這真是一段奇妙的緣份，但那段期間我們從未謀面（認識王孟亮是返台以後的事），因為當時我窮得沒有錢搭地鐵，當然也談不上請吃飯，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五年之內，我的研究題目從無到有，在一個嶄新的領域內探險，二年之內完成一部六百多頁、到今天仍受西方學界肯定的博士論文，這都要歸功於「歐吉桑」長年以來默默、無私的帶領和付出。當年我通過電話提問，向王世慶先生請教了許多寫作上遇見的瓶頸。我這些提問是從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思考出發的，而這些實證問題有的「歐吉桑」已經出版（例如，〈日據初期台灣撫墾署始末〉，《台灣文獻》，38卷1期，1987年3月），有的他正在醞釀撰寫（例如，〈皇民化運動前的台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思與言》29卷4期，1991年12月；同步發表在《史聯雜誌》19期）。「歐吉桑」的這些專論日後都彙整到他上述的幾本專書中，時至今日仍然是近代台灣社會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研究。

對於我無數的提問，「歐吉桑」總是毫無保留地說明、演繹，並提示我進一步閱覽相關文獻。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項議題：（一）鴉片煙與降筆會：囑咐我詳讀《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警察沿革誌》，參考李騰嶽的論文（「鴉片在台灣與降筆會的戒煙運動」，《文獻專刊》，4卷3 & 4期，1953年）以及他本人剛出版不久的〈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台灣文獻》37卷4期，1986年12月）；（二）大字（おおあざ）、小字（こあざ），亦即大正九年（1920）以前的大庄、小庄：指示我參考《台灣省通志稿》的行政區沿革篇（氏著），並特別說明戰後初期纂修的《台灣省通志稿》，其史料價值比後來增修、整修和重修的通志稿和通志來得高；（三）農會沿革：特別以三峽為例說明，並指示我參考《三峽庄誌》（三峽庄役場

編，1934）、《鶯歌鄉土誌》（今澤正秋編，1934）等日治時代所編的地方志。此外，我的提問還包括「同風會」、「皇民化」、「地方制度」、「水利組合」、「撫墾署」、「祭祀圈」等日治時期的制度沿革。我強烈地感受到「歐吉桑」用功之勤（參見「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台灣風物》61卷2期，頁124-139），而他一絲不苟的研究態度也形塑了我日後的研究風格。

* * *

返台以後，每次以中文寫作，出版前我都會請「歐吉桑」過目；我一九九二年返台之後最初展開的口述歷史系列訪談計劃（「保正、保甲書記、街庄役場」）也不例外。在哥大時雖然旁聽過口述歷史的課程（哥大的口述歷史室很有名，也開有相關課程），但剛返國之初，對於如何展開口述歷史實在毫無概念，幸好有「歐吉桑」從旁協助。原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剛好在一九九〇年做過一次全省性的「地方耆老」調查，年齡層大約介於七十五到九十五歲。由於「歐吉桑」的引介，我認識了鄭喜夫先生，而鄭先生也很慷慨地提供名冊給我。由於掌握了這個名冊，我日後才能展開一系列的問卷調查和口述訪談，包括「中縣口述歷史」（第四輯）。這些計劃我都是獨力執行的，為期大約八年。這是關鍵的八年，因為到了九十年代才做口述歷史，是和時間競賽，但還不算遲；一九九五年初，我到台史所任職後所執行的「台籍日本兵」訪談計劃，基本上也是參考這個名冊而展開的。這段期間是我學術生涯的成長期，也是一段痛苦、修正又反修正的適應、轉型期——至今我仍然只將半隻腳踏入「台灣史研究」這個殿堂內。這段時期（1993-2003）的「歐吉桑」已經獲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員，同時也擔任了台史所的諮詢委員。他仍然熱情地提攜無數後輩，同時也用他寬容而溫煦的心，見證了我一路掙扎著走過的心路歷程。

近十年來，「歐吉桑」因為兩眼開刀後，閱讀困難，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親自指導我。剛返國那些年，我不太會中文打字，又因為長期住在國外，對於中文寫作時常感到是件難事，幸好有「歐吉桑」從旁加持，使我回國後的適應期大幅縮短。事實上，九十年代中期「歐吉桑」還曾應我的不情之請，一對一地無償幫我上課。通常是由我先提問，不外是我平日閱覽日文資料時所遇到的問題，然後他當下補充訂正；有時是我朗讀自選的日文段落，他接著訂正我的日文拼音。這段「培訓」期間不長（其實也不短），前後有三個月，地點就在他在社科所的研究室，每週二小時。這段面對面的日文「特訓」確實使我日後在論文宣讀上受益不盡。

一九九三年「歐吉桑」進入中研院後，迄至他二〇〇三年因為身體關係請辭，共擔任了十年的兼任研究員，月領三千元「車馬費」。早些年，「歐吉桑」身體還好，住在樹林，每次來往台北，都搭台鐵區間車到松山火車站，再換公車到中研院；加上步行和轉車，每一趟起碼要花上一個半小時。可以想像，在上下班的尖峰時段，這樣搭車上下班對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一定相當辛苦。有一次我實在看不過去，勸他不必勉強出門，但他認為既然接受兼任職，就應該常常到辦公室。這就是「歐吉桑」。他用堅毅的精神撐起了病弱的身軀，在這段比較安定的中研院時期，陸續出版了代表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幾本專書。

一直到他最後的日子，「歐吉桑」總是很少拒絕人家的請託。「台灣史研究」向來畛域分明，但「歐吉桑」的奉獻是無私的，因此來自公私各方人脈的邀請也就與日俱增，尤其是在他進入中研院之後。他的第四次「退休」生涯實際上是極為繁忙的，職務包括擔任學術審稿、評鑒、諮詢、會議（主席、評論），以及擔任教職和論文指導等，此外還有各級地方機構和個人私下的各種請託。這些工作雖然繁重，卻反映了台灣學界和民間社會對他終身貢獻的最大肯定，因此他也總是不負所望地全力以赴。我猜想，他甚至是喜悅的——雖然他的心靈是孤寂的，他的病體日益衰弱。「歐吉桑」最後一次出席的學術場合是去年（2010）九月底臺史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圖說」），那時的他身體已經十分孱弱了，數月之內曾經兩次出入加護病房。

我曾經不只一次告訴「歐吉桑」，將來我的中文書出版，一定要獻給他。沒想到，因緣際會，回國以後這些年，我在國外用英文（近年也用日文）發表的機會反倒比國內用中文的場合多。我的兩個中文書寫作計劃目前都只進行了一半，英文書（*Taiwan in Japan's Empire Building*, Routledge, 2009）反倒先一步出版了。對於無法實現對「歐吉桑」的承諾，我曾經不只一次向他抱歉。沒想到他還是等不及，先走了，使我感到無限地悵惘。

和悔恨。

王世慶先生堅忍不拔，逆來順受。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是一月十五日傍晚，地點是大安森林公園附近一家安養院。他最後的身影是他一生的寫照，也彷彿是對當今老人看護制度的無言抗議（安養院問題重重，此文從略）。王先生一生默默耕耘著台灣史研究的園地，他的治學典範令人景仰，他的警效令人懷念，他的貢獻在當代學者中少有人能出其右。他是我永遠的「歐吉桑」。



圖說：

王世慶先生最後的學術身影（2010.9.25），
「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院臺灣史研究所。